

引领明代万历文坛,还看“山左三家”

□冬华

政坛文坛三杰

“山左(山东省旧时别称)三家”并称,最早见于公鼐《哭于相毅城先生》,其诗云:“三星聚岳是何年,忽折中台欲问天。”

在诗中,公鼐将自己与于慎行、冯琦并称“三星”,并回忆起三人于明代万历二十七年(1598年)一同登泰山的经过。

近现代以来,“山左三家”的名称逐渐明确,郭绍虞在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中最早将三人并列,指出三人的文学理念“真可谓同出一模”,是“公安派”诗论的重要前驱及羽翼。李圣华在《晚明诗歌研究》中说“三人歃血为盟,不愧为万历前期山左三家”,明确提出“山左三家”之称。

于慎行,字可远,平阴人,天资聪颖。明代隆庆二年(1568年)中进士,任翰林院庶吉士,师从殷士儋、赵贞吉。隆庆四年(1570),授翰林院编修,入史馆。万历二年(1574年),升翰林院修撰,敕授承德郎。万历五年(1577年),因坚持疏谏张居正“夺情”,引张居正不悦,擢升受阻,后引疾而归。万历十一年(1583),张居正倒台,于慎行入京复职,万历十七年(1589年),掌詹士府,晋礼部尚书。次年上疏奏请立储,言辞激烈惹怒神宗,又因山东乡试泄题事件遭人构陷,心疲力竭,遂于万历十九年(1591年)告老还乡,于慎行开始了长达十七年的隐居生活。居家期间他著书立说,作《读史漫录》《兖州府志》,万历三十四年(1601年),以原官加太子少保兼东阁大学士复职。次年病故,谥文定,赠太子太保,荫其子于纬为中书舍人。

冯琦,字用韫,临朐人,著有《宗伯集》《北海集》《经济类编》等。冯琦家世清明,累代进士。万历五年(1577年)中进士,年仅二十岁,从此仕途亨通。万历七年(1579年)授翰林院编修,次年入史馆。万历二十一年(1593年)擢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,万历二十九年(1601年)晋礼部尚书,先后主持皇太子冠礼、皇太子婚礼及册封诸王礼三大典礼。万历三十一年(1603年)卒于任上,年仅四十六岁,有遗疏《人主当知四方事》,语极恳挚,帝哀之,赠太子少保。

公鼐,字孝与,蒙阴人,出生于馆阁世家,五世进士,门楣显赫,有《问次斋稿》《问次斋续稿》《问次斋西游稿》传世。公鼐虽年少成名,但科举之路十分坎坷,自万历七年(1579年)应试无果后,至万历二十九年(1601年)才举进士,进入仕途。万历三十一年(1603年),授翰林院编修,熹宗即位建元天启,公鼐擢为詹士府詹士。天启四年(1624年),晋礼部右侍郎,但好景不长,次年被罢职。天启六年(1626年)卒于家中,年六十九岁,有“两代帝师”之称。

三人之中,于慎行最为年长,冯琦入仕早,与于慎行同朝为官数载,二人政治、文学理念一致,志趣相投,亦师亦友,有“于冯”并称的美名。公鼐与冯琦同年,感情

地域文化对文学创作影响深远。“山左三家”是明代万历前期山东文坛的领军人物,于慎行、冯琦、公鼐三人以齐鲁文化为根基,标举“齐风”,主张诗文复归风雅而不简单模古拟古,提出诗文革新、诗抒真情、经世致用等一系列主张,为万历文坛注入新的活力。

齐鲁悠久的历史与文化,是三人诗文内容的重要体现,山东山川风光更是成为三人吟咏歌颂的对象。



平阴云翠山。摄影/崔健

临朐名山,百步崖是沂山著名峪谷,公鼐此诗描写百步崖危峰险峻之势以及泉瀑相涌、松林繁茂之景。公鼐还喜欢游览冯氏冶泉,有诗《夏日重过冯氏冶泉山亭》与《用韫同至冶湖,冯将军邀游池亭,遇雪》等。冶泉是临朐老龙湾主泉之一,绿竹成林、景色优美。

“齐风”引领诗坛

自明代中叶起,诗文巨擘李梦阳、李攀龙、王世贞等“前后七子”,为打破雅正有余、生气不足的台阁之风和因循守旧、死气沉沉的八股之文,展开了一场影响力空前的文学复古运动。因极端强调复古,他们走向了模古拟古的岔路,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坛注入一股新鲜力量,但又使诗文过于注重格调而缺乏性情,因此饱受争议。

此后,复古派式微,文学地域化明显。在不同文化影响下,各地形成了不同的文学派别,虽均反对复古为宗,但诗文理论却大相径庭。当时大体以南北为界,南方前期有袁宗道、袁宏道、袁中道三人为主的“公安派”,率性而谈、不拘格套、风格清新;后期以钟惺、谭元春为主的“竟陵派”兴起,风格幽深孤峭,语言晦涩难懂。而北方前期正是以于慎行、冯琦、公鼐等人为主。各方竞相输出自己的文学观点,希望能在文坛中得到认可。

山左文化以齐、鲁古国为源起,齐文化开放多元,鲁文化尊礼雅正,演化成为齐鲁文化。“山左三家”对“前后七子”并非全然否定,而是对历下李攀龙等人的大雅之风赞赏有加。因此,他们提出“齐风”的主张,继承李攀龙的大雅之风,为“齐风”赋予了宏大雅正的核心内涵。

同时,三人对复古派观点进行了修正,于慎行“文以神化”,指出诗文应在创新中发展,在性情中体现自我,公鼐亦在《古乐府序》中,认为历代诗文均有自己的时代特色,而非模古拟古。冯琦对性情、创新的主张更加明确,对模仿古人文字反对最为强烈。三人均强调文以载道、经世致用,认为文学创作应与现实息息相关,所作内容需要注入情感、承载教化、体现生活。

总的来说,“山左三家”追求的“齐风”以雅正为纲,轻格调而主性情,追求宏大浑厚的诗文风格,并在诗文创作中身体力行,追求革新、独树一帜,形成了一股不同于“前后七子”复古派和公安派的诗歌潮流。三人提出的“齐风”,对山左文化的输出具有重要作用。

“山左三家”在万历诗坛中承前启后,为山东文坛带来了新的生机。北方邢侗、葛曦等名家与三人相和,共同推进山左文学的发展;南方“公安派”吸收三人“性情”之论,独抒性灵。万历后期,王象春、李若讷等人在三人基础上,提出“齐气”的观点,更加注重个人抒发,进一步丰富了山左文学的内涵。

(作者为文史研究者)

描绘山东好风景

于慎行一生半隐半仕,闲居之时遍游家乡,所到之处皆付吟咏。于慎行居于兖州府东阿县(今平阴县东阿镇),当地西有黄河灌养,南有湖泊润泽,泰山余脉横贯其中,风光秀丽。

云翠山为平阴名山,位于慎行居所东南方三十里处,林木青翠、重峦叠嶂、山泉相依、古迹众多。于慎行钟情此地,将书房命名为“云翠山房”,曾多次登览,留下诗文。万历八年(1580年),于慎行与仲兄慎思、五弟慎登游云翠山,观南天观。南天观位于云翠山北部山腰,元代建成,明代扩建,为云翠山一大胜景。

此次出行,于慎行有诗《从二

兄登云翠山南天观十二韵》,描写了云翠山山峦崔巍、山河相依的奇伟景象,以及雨后山间云雾朦胧、村落隐现的幽静神秘。

万历九年(1581年),好友朱维京来访,于慎行邀其同游云翠山,作《游云翠山泉记》,通过移步换景的手法,对云翠山沿途诸泉进行生动描绘。于慎行此行另有《望山监山》《望云翠山绝顶》《云翠山洞送可大南还》等诗作。同年,于慎行与同县孟一脉南游曲阜,游览孔林、孔庙、少昊陵,《游鲁城记》记录游览过程,描绘其中风光,表达敬仰先贤之情。游毕,二人继续东行,至泗水,观诸泉,据于慎行《游泗上泉林记》记载,二人与当地友人先后觞于鲍庄之泉、石窦之泉、赵庄之泉,后至泉林。次日二人向南,前往峄山,作《游峄山记》。

泰山也是于慎行钟爱之地。居家期间,于慎行曾七次登岱,留诗《泰山道中》《下泰山游三阳观》《灵岩竹房对雨》等二十余首,《登泰山记》一篇。

冯琦与公鼐亦曾数次登临泰山,冯琦有诗《泰山歌送庐东麓》,称颂泰山“出入日月兴云雷,去天不知几百里”的奇壮气势,同时表达自己报效家国之志。公鼐有诗

《辛巳登泰山》《登岱和于大宗伯八首》等,风格均雄浑豪壮。万历二十七年(1599年),“山左三家”相约登岱,游三阳观、灵岩寺等地,数日方返,成就一段佳话。

公鼐还数次登游家乡的蒙山,创作了大量诗文,对蒙山不同景点、角度、时令均有不同的描写。万历八年(1580年),公鼐陪父亲游蒙山,受父命作《东蒙山赋》,赋中对蒙山历史、山势、景致等详细描写,语言华美、笔法雄浑,极富浪漫与神秘色彩,展现了蒙山上下四季的整体风貌。

除此以外,公鼐还有大量诗文描写蒙山,山峪、寺观、泉水等无不涉及。《蒙山瀑布》写蒙山瀑布如银河飞落,万丈有余,胜过庐山仙境;《止龟蒙绝顶》写登顶蒙山主峰龟蒙顶,远眺山巅如“龙湫远自空中落,鳌背疑从海外悬”;《望蒙山》写“蒙山最高是双峰,上有云烟几万重”,极言山高。

公鼐足迹亦曾至曲阜、登峄山、游泗水,作《峄山歌》《泗上送伯举西游》等诗。他还曾多次登临崂山,观东海之苍茫,留下诗歌《登劳山诗》《宿劳山黄石官》《至劳山华楼》等。

公鼐与冯琦有世家之好,经常游走于冯琦家乡临朐。沂山是